

曹子建賦之情志研究

黃品宏

摘要

曹植，字子建，是建安文學集團中的最後一人，然而年僅四十一歲即憂憤而死，這一生可用風華正茂、少年聰敏形容，也能用抑鬱終生、才不能用概括，而這些無關乎子建本人的情與志，在二者關係中，文才互映，志性相衝，年少時的浪漫豪放之情性與實現政治抱負的性格要求有所衝突，致使失位東宮，而黃初以後子建已喪失一切能實現其志的途徑，在政治的絕望下使得後期子建於文學中的性格轉向哀婉悽怨，而早年視辭賦為小道的想法也昇華成直追屈騷之意。

本研究旨在梳理曹植情與志間的衝突與交融，在建安大時代下積極勃發的思潮至屈騷抒懷的文學情感，皆在曹植的情志中可見，冀望本文能補充歷來曹植賦面向之研究。

關鍵字：建安文學、曹植、魏晉賦。



一、前言

東漢建安時期作為文學史上個人性格之啟蒙階段，在歷來各家學說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建安代表作家以三曹父子與圍繞其周圍的七子為代表人物，從曹公古直為始，至子建愴然悲戚為結，呈現建安時期以鄴下集團為主的文學風貌，本研究選建安文學之尾「曹植」為題目，以其辭賦為範圍，試著透過子建辭賦中的題材、意象、移情等面向梳理其情志間的關係與衝突。

歷來研究子建的學者多矣，或出自其文學地位，或重其在建安文學中的重要性，²⁰⁸但鮮有人直指子建之本心，情志，情為感性之特質，子建帶有尋常文人的愁善與不羈，其天真爛漫的特質從其性格與早期作品中不難理出，這股帶有些許幻想與「不切實際」的文人之情包藏有對社會現實的抱負，但在面臨社會性的要求時子建本人卻無法從文人轉換成政治家，是以醉誤軍機，誤闖宮門，在其父下禁酒令之時尤其好飲，可見在曹丕登基前，曹植的性格與政治抱負上的實現即有所衝突，是以其情志關係並非一生之中完全單一，前期的浪漫性格與現實政治的衝突，後期的處上之猜忌，居封地不能用，皆是有原可察，為何導致四十一歲鬱鬱而終的結果，一者性格上的缺失，二者政治上的幼稚，三者兄長猜忌，使得子建落得悲慘結局。

本研究採知人論世與文本分析之法，以三國志為引，參子建之性格與其兄子桓之矛盾，再分析其文本，即辭賦的內容，冀以論述子建情志的衝突與交融在何處，本研究希望能對子建文、情、志、才間的關係有所補全，文即其文本，情即其個性，志即其抱負，才即其能力，又可細分為筆之文采與政之文質，爛漫之情與風骨之情，治國之志與人倫之志，文學之才與政治之才。

²⁰⁸ 如陳盈妃：《歷代詩話中的「曹植論」研究——以宋遼金元明詩話為範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年。此為論其詩志與風格；游嘉琳《素樸與感傷：漢魏心靈與曹植詩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20年。此為漢魏時期文學思潮之研究。至於曹植賦之研究多為單篇賦或其中意象之論述，如呂筱薇《宋玉、曹植、陶淵明辭賦中神女形象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2年。綜上可為近代曹植研究各面向之明示，甚少關於曹植賦學與以賦為體之文學觀探析。



二、曹子建志之建構

志可以視作一價值觀，可分群體之思潮與個體之勃發，在大環境時代下必有一主流價值呈現，在鄴下文學集團之時代即為建安風骨，而受此思潮影響，子建作為一個體其志有接根於建安風骨的部分，亦有因其特質獨別於眾人的部分，而志進階的影響其文學觀與寫作方向。

（一）建安風骨之形成與對子建之影響

要論子建首先要了解建安的背景，作為建安文學最後一人的子建與建安文學集團間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而所謂風骨因何而來，這是包括子建在內整個鄴下文學集團的核心價值，是以本文理當先闡明建安風骨在本研究中的先導地位。

《文心雕龍·時序》言：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²⁰⁹

可知建安文學帶有雅好慷慨、風衰俗怨的特性，而這當從獻帝播遷以來的世積亂離之由。當時的社會兵荒馬亂，世俗中民不聊生，廟堂上閹人外戚亂政，是以黃巾聚眾起義於下，士子誦吟梁父於野，處於這樣的亂中以曹操為首的鄴下集團橫空出世，締造出新的入世價值以取代儒家經學的斷層，正值東漢黨人玉碎，身處亂世中士大夫失去其精神依託，在這個前提下才有鄴下悲慨的產生，在曹操唯才是舉的號召下，文人士子以七子為代表聚集在鄴城這一亂世中的安樂之所。²¹⁰

²⁰⁹ 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頁 815。

²¹⁰ 關於黨人人格之破碎詳見李建中著《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



在世積亂離的背景下，民間一片慘狀，王粲〈七哀詩·其一〉：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泣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凌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²¹¹

同樣的慘狀在蔡琰的〈悲憤詩〉中也有描述，這一幅人間地獄正是東漢末年的真實寫照，白骨蔽野，婦人棄子，訴說著比古詩十九首更加淒慘的現實，所謂悲慨當由此而發，而建安風骨正是由此巍然生長。建安，指的是東漢獻帝之年號，即三國前的建安時代，風骨的解釋眾說紛紜，有品評人物的說法²¹²，也有文學現象的說法²¹³，筆者以為若說建安風骨當明指為此時代之核心價值，風，有國風之本，即采風之實，亦有風情之意，即由此言情，文人以民間之質為文，依文而感慨就是建安之風，易言之，可以說是文人對社會的感性與觀察，至於骨，當為支撐此時代的核心精神，同春秋戰國時的周文疲弊，建安朝也面臨著武帝獨尊儒術以降，黨人人格的崩壞，當忠君與修德²¹⁴已不再是時代主流，建功立業、效力明主，安定天下遂成為建安時期的核心價值，即為骨。

基於建功立業的潮流，文學作品多有鼓吹軍事行動者，子建之情志在此亦有很大的比重部分，如〈東征賦〉：

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旗轉而心異兮，舟楫動而傷情。顧身微而任顯兮，愧責重而命輕。嗟我愁其何為兮，心遙思而懸旌。

²¹⁵

登高而望，六軍之眾，幡旗舞，船槳動，一片軍容鼎盛之狀，這一方面是寫魏國軍威，但另一面我們也可以看見作者站在贊成軍事行動之立場，為了結束亂世，完成天下一統，武力是直接的方法，是以不同於革命，戰爭的浪漫在此鋪展開來，子建在此反詰，對比軍容之盛，我一個人是多麼的渺小，但也別妄自菲薄，畢竟身上有留守鄴城的責任，從嗟我愁其何為兮，心遙思而懸旌。

²¹¹ 蕭統編《昭明文選》，三民，頁995。

²¹² 見劉邵《人物志》。

²¹³ 見劉勰《文心雕龍》。

²¹⁴ 忠君當為尊劉氏為帝，然東漢末年，皇室已失去坐擁天下的能力。修德當指經學為主的儒家思想，但隨著曹操標榜唯才是舉，繼而有四本之論，養性修德在此時亦名存實亡。

²¹⁵ 曹植著：《曹子建集》臺北：三民，2003年，頁1。



也可以感受到子建對於戰場的嚮往，這種嚮往就是基於建安風骨建功立業的主旋律，在曹操統一北方之時，北方百姓獲得了初步安定，而此時雖百廢待興，但往前的步伐顯而易見，正是這股蓬勃昂揚的氛圍，促成鄴下集團中建安文人嚮往建功立業的激情，這股激情同樣也可以套用在曹植身上。

（二）子建賦中之志解析

上文論及曹植本人的志業與抱負有很大的部分依附於建安風骨下建功立業，投效名主的思潮，故子建之「志」同建安時期的文人一般，不再崇尚以漢時經學為主流的修德與參天地，在亂世中才能見用方是文人所追求，前有公瑾助伯符以定江東，後有孔明輔玄德而立荆蜀，由於處在大分裂的時代，建功立業與軍事征伐不同於漢代對外族的征戰，而是轉為逐鹿中原，在一統天下的最終目標前文人本身往往會對軍事行動極盡誇耀武力之能事，武力在這個時代被當成實現抱負的最大途徑，在曹植的賦中也往往可以看到他崇尚武力的地方，如〈寶刀賦〉：

有漢皇之明后，思明達而玄通。飛文藻以博致，揚武備以禦兇。

乃熾火炎爐，融鐵挺英。烏獲奮椎，歐冶是營。扇景風以激氣，飛光鑑於天庭。爰告祠於太乙，乃感夢而通靈。然後礪五方之石，鑿以中黃之壤。規圓景以定環，摠神思而造象。垂華紛之葳蕤，流翠采之滉漾。

故其利：陸斬犀革，水斷龍角。輕擊浮截，刃不纖削。踰南越之巨闕，超有楚之太阿。實真人之攸御，永天祿而是荷。²¹⁶

之所以賦寶刀並不單單只為恭維與遊戲，刀本是武力象徵，是以賦寶刀也有其背後的意涵存在，子建之崇尚武力是為了一展抱負，故寶刀所象徵的強國之勢正是他心中施展才能的舞台，開頭說「飛文藻以博致」在於其父曹操曾下的求賢令，如建安十五年時：

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²¹⁷

基於此，在唯才是舉的才性觀下，文人不再尊周崇禮，而改為尚縱橫者流，重於謀天下之能，在這個前提下子建本人也是同樣的心態，他希望自己的才能

²¹⁶ 見《曹子建集》三民，頁72。

²¹⁷ 見《魏志·武帝紀》。



可以施展，可以實現平天下的抱負，故之後對寶刀的描寫看似是融洽之過程，實則可以理解為子建心中的天下理念，他想效法其父曹操御使寶刀之鋒以問鼎中原的志業，但是年輕的曹植胸中有沒有足以支撐其抱負的韜略，一介文人鼓吹武力在治國與天下博弈中委實有些不切實際，對於天下的看法顯然此時的曹植還是顯得幼稚的，不像孔明隆中對，公瑾伐益洲，子敬榻上策等等，子建作為一個翩翩貴公子，雖生於群雄爭霸的亂世，但對於現實國與國的博弈可能還沒有完全的認知，他曉得軍事的內容也知道百姓之所求，但可能獨獨缺少一個參與天下博弈的眼界，如〈寶刀賦〉、〈東征賦〉之所述，對於治國的具體策略子建明顯認識不足²¹⁸，在往後的人生中也沒有相對的策略問世，於黃初、太和年間上書求自試亦未有深論所謂天下大勢，所以這份「志」明顯參雜諸多浪漫情懷於其中，易言之，對於其才與其志，若看作是文人之文才所衍生的治國平天下之志，毫無疑問的子建終究只能流於文人層面，而非像孔明、公瑾、奉孝等人一般為治國之能臣或謀國之大夫。如其〈登臺賦〉：

從明后而嬉遊兮，聊登臺以娛情。見太輔之廣開兮，觀勝得之所營。臨漳川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公恆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雖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以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²¹⁹

誠然，此篇賦是在曹操率眾登銅雀臺時所作，亦是子建年少成名之契機，雖然此賦之作用有大部分是為唱酬而作，但也可以視為子建心目中理想的基石，「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雖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這不就是子建理想中的國度嗎？給予百姓安居樂業，如春秋時齊桓公、晉文公一般，文治武功顯赫一時，稱雄於諸侯中，以二霸喻魏國其中用意十分明瞭，而既然身處如此強國，更進一步無非是滅吳剪劉完成一統天下的理想，但是到這一步二十一歲的子建明顯是沒有諸侯角逐的認識，甚至二十八歲於樊城之戰時把戰爭視為兒戲，竟因飲酒而貽誤軍機²²⁰，而至其兄曹丕繼位，曹植已經失去任何參與軍國大事的機會，而此時他尚未滿而立之年，所以說可能是基於文人的理想與憧憬才會把天下作為心中之志，而隨著時間流逝，對於建功立業子建依然

²¹⁸ 〈東征賦〉中以守鄴為小，子建之語氣更加嚮往領軍作戰之重責。〈寶刀賦〉則鼓吹武力平天下之理念。

²¹⁹ 見《曹子建集》三民，頁 67。

²²⁰ 《三國志》裴注雖有因其兄曹丕之故，然不論作何開脫，子建因飲酒而怠慢增援曹仁實為其生平一大敗筆。



停留在華采的文人世界，而非質實的國士層面。²²¹

三、子建賦知情志衝突

子建的志在上述章節已經討論過了，本節要更深入的從子建之情性對應到其志的衝突所在，為何說他的情與志無法同時實現，在於其本人的性格與現實的政治問題是無法融合的，而到了黃初年間子建更是失去了任何滿足其志的途徑²²²，導致後期的志甚至有一部分悲憐為渴求人倫之樂，實在令人不忍目睹。

首先我們可以先了解子建的特性，《三國志·魏書》曰：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²²³

其中我們可以歸納三點，一、曹植天生聰敏，善文，能以小小年紀寫出高妙的文章。二、性格豪爽，不尚華美，而與曹操問對每每切中其要，其人絕非內斂型人格。三、曹操諸子中曹植文采斐然又聰敏機智，是以特見寵愛。上述三點中，第一點說明其天分，第二點說明其性格，第三點說明其地位。子建的人生就是圍繞在這三個面向展開，因為天分，所以自持高志；因為性格，所以難容於政治圈中；因為地位，導致兄長無盡的猜忌，易言之曹植的悲劇人生從《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中的第一段就可以預測了。

對於曹植的天分後世早有確論，在本文就以其性格為主導，性格的特質是構成其情很重要的一部分，上有言曹植不尚華麗鋪張而有豪放性格，在其《節遊賦》中可以見到：

遂乃浮素蓋，御驂騮，命友生，攜同儔。誦風人之所歎，遂駕言而出遊。步北園而馳驚，庶翱翔以解憂。望洪池之滉漾，遂降集乎輕舟。沉浮蟻於金壘，行觴爵於好求。絲竹發而響厲，悲風激於中流。且容與以盡觀，聊永日而忘愁。

²²¹ 曹植前期之志深受建安風骨影響，然而缺少現實證明的機會（抑或浪費機會），而曹植自黃初以後根本沒有任何機會施展所謂的抱負，是以實際上他的志也只能在詩文中呈現。

²²² 文帝、明帝時期子建封地頻頻遷徙，連最基本宗親間的人倫之樂都是奢求，更遑論實現胸中抱負了。

²²³ 見陳壽著，裴松之注《三國志》，頁 557。



嗟羲和之奮策，怨曜靈之無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諒遺名之可紀，信天命之無常。愈志盪以淫遊，非經國之大綱。罷曲宴而旋服，遂言歸乎舊房。²²⁴

此賦之目的在於勸時人莫過於放縱遊樂，因當時貴族子弟多有好尋歡作樂而不及世事者，是以子建做此賦以明其心志，遂乃浮素蓋一段的描寫極盡逍遙之意，我們看到一個翩翩佳公子倘佯在景色風光之中，此段可以看出子建本身豪爽任俠的性格，能享受萬物風流，在天地間恣情縱意，非心胸寬闊者是無法發出「且容與以盡觀，聊永日而忘愁。」的感嘆，末尾說「愈志盪以淫遊，非經國之大綱」可以了解子建並非一般尋歡作樂的貴族子弟，他心中有天下之抱負，怎能因為玩樂而喪心殆志，此賦中一個理想的文人情志躍於紙上，但如此理想浪漫的人格終被現實擊潰，因為一系列的政治錯誤導致其失去了入主東宮的機會，其兄曹丕登基後曹植再也沒有了自試的機會，故黃初以後子建情志間的衝突從理想性格與現實政治的矛盾，轉換成自悲自憐且自用的情感與人倫不復、抱才守恨的矛盾，很明顯後面這一階段的衝突才是子建最核心的創作時期。如黃初三年時名垂千古的〈洛神賦〉，在此採李曰剛教授的說法²²⁵，此賦為子建喻今自傷之作，洛神即理想的化身，但卻是與自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何其悲哀，人神殊途，正如自己與朝廷間的關係，而且自己正當盛年，這股怨竟然只能可悲的怨自己的年紀，在旁人細細讀來實乃戚戚愴然，雖說子建為建安文學集團最後一位作家，但我們不能忘記他卒於四十一歲，曹丕登基時他僅二十九歲，如此風華正茂的年紀卻只能囚於封地，一輩子不能見用，在建安風骨積極進取、建功立業的思潮下，此時期子建於文學中反常的塑造出其悲愴性格，而這時已不復之前的豪放任俠了。

四、子建賦中諷上、寄託之文學觀

奸氣即為政治腐敗下的朝廷氛圍，此時察舉出的孝廉不知書又父別居²²⁶，使得民間社會一片烏煙瘴氣，正是這種腐敗氛圍使得蝙蝠孳生，奸邪之徒甚囂於塵，曹植藉由這篇賦諷刺社會現象，以比為手法，物為題材，這種詠物小賦在魏晉時曾出不窮，子建可能就是先導者之一，總而言之，關於辭賦之作用在東漢末明顯有所變質，雖保留宴遊唱酬的功能性，但議論已不再為隱刺為主，而是一針見血不再含蓄的揭露黑暗，關於這部分有別於子建辭賦小道的範圍。

²²⁴ 見《曹子建集》三民，頁13。

²²⁵ 見李曰剛著《辭賦流變史》，頁140。

²²⁶ 見〈桓靈時童謠〉。



眾所周知，後期子建情感狀態十分低迷，或是求於神仙，或是自卑自憐，哀戚不能自己，這源於其志完全絕望之因由，魏文帝曹丕在位時大力打壓宗親，對於兄弟更極盡迫害，子建作為曾經東宮儲位最有利的競爭人選自然是曹丕的重點防備對象，在這種完全無望自試的環境中子建只能寄情於文，其〈與楊德祖書〉中言：

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採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以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²²⁷

之所以說辭賦小道，是因為相較而言志業更加重要，二者相比取其重，但當志業無望，只能無奈從文，曹植治史有一定水平，從〈漢二祖優劣論〉、〈魏德論〉等著作可知，子建史觀有其獨到見解，所以這裡的成一家之言可能即為治史，而非前面所提之辭賦，可以把為文治史視為子建志的延伸，其效仿春秋與太史公的論述明顯也處在其志的範疇，但遺憾的是黃初以後子建之志完全破滅，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從另外悲慘的層面實現了，這是政治上完全絕望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曹植只能可悲的寄情於詩與辭賦。

子建於辭賦中的寄託皆根於現實的困境，如〈九愁賦〉曰：

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哀。踐南畿之末境，越引領之徘徊。眷浮雲以太息，願攀登而無階。匪徇榮而愉樂，信舊都之可懷。²²⁸

此賦代屈原陳辭，實為抒自身之悲愁，第一段即可看出作者走投無路的窘境，又：

履先王之正路，豈淫徑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恥干媚而求親。顧旋復之無軌，長自棄於遐濱。與麋鹿以為群，宿林藪之葳蕤。野蕭條而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生？寧作清水之沉泥，不為濁路之飛塵。踐蹊徑危阻，登岿嶢之高岑。見失群之離獸，覩偏棲之孤禽。懷憤激以切痛，若回刀之在心。²²⁹

不作趨炎附勢之徒，又見棄於君王，作者如失群之離獸，偏棲之孤禽，報

²²⁷ 見《曹子建集》三民，頁450。

²²⁸ 見《曹子建集》三民，頁37。

²²⁹ 同上註。



國無門，忠君失塗實乃回刃於心痛不可言，此賦名為九愁，應當不是九歌、九辯之體，九為極數，當為愁極之意，全賦屈騷情節滿溢而出，正切合子建困頓之境，諷有之，無非以楚王喻上，其實自擬為屈原時就有此諷之涵義了，再者寄託，實為報國忠君之本意，如前面所述，子建之志業基於建安風骨的激極勃發，在〈與楊德祖書〉中不惜說辭賦小道也想完成角逐天下之志，黃初以後子建的遭遇同於屈原的流放時，心中當然無法接受，故有九愁之賦。

子建寄託之終極理想當為洛神，黃初時所作之〈洛神賦〉即此理想之具現，他描寫洛神之形體、容貌、衣飾、顏色見於第二段，曰：

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耀秋菊，華茂春松。鬋鬢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回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渠出淥波。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雲髻峨峨，修眉聯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輔靨承權。珪姿艷逸，儀靜體閒。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璨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乎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²³⁰

同於屈原離騷中的香草美人，只是子建把這份追求理想的浪漫更加凝實，使其成為一切美好具現在人間的洛神，神與人終歸殊途也是子建最後的不切實際，人神之戀如同逐臣與朝廷一般，這種在辭賦中對於理想的寄託與自身感遇的抒發在漢末亂世也有成為主流的現象，如王粲〈登樓賦〉也如此種生世寄託在裏頭，但子建這種美人喻理想的浪漫筆法有回溯先秦楚辭的傾向，如他在序中所言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故很明顯這種先秦辭賦寄託的內容，經過漢大賦的功能性消蝕後，在建安以後又重新回歸為辭賦文體的內容，在建安最後一位文人曹植身上我們看到了屈騷又重新在現於世，脫離了所謂辭賦小道。

²³⁰ 見《曹子建集》三民，頁55。



五、結語

對於曹植的文情歷朝歷代皆有詳細論述，自劉勰、鐘嶸已降，古文人對陳思王詩文之推崇不勝枚舉，在今時亦有多數研究曹植的論文，本文集中於其情志間的關係，在論建安風骨之背景時闡明曹植之志的根由，在於時代的世積亂離與經學斷裂的背景，後論述其志在辭賦中，於前期明顯更偏向於華采之文而非質實之志，明顯停留在抒發浪漫的文人面向，也論述子建的性情與現實的衝突，若要實現志，則必須放棄一部分的情性，但對於完全的理想主義者曹植來說，浪漫終歸被現實的政治擊碎，使得曹植從前期豪放任俠的性格轉為後期的悲戚哀婉，其〈靜思賦〉、〈出婦賦〉等作品都有此傾向，最後說明子建賦中的文學觀，即諷上隱刺的社會功能性與寄託自傷的文學表現性，辭賦至此應當脫離了兩漢以來雕蟲小技的桎梏，重回楚騷的文學價值。



六、參考書目

(一) 專書

- 王國瓔著：《中國文學史新講·上》臺北：聯經，2016年。
- 吳云編：《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北京：2001年。
- 李曰剛著：《辭賦流變史》臺北：文津，1986年。
- 李建中著：《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武漢：湖北教育，1998年。
- 周振甫著：《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1984年。
- 曹植著：《曹子建集》臺北：三民，2003年。
- 陳昌明著：《六朝文學之感觀辯證》臺北：里仁，2005年。
- 陳壽著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世界，1985年。
- 傅錫壬：《楚辭讀本》臺北：三民，2020年。
- 廖國棟：《建安辭賦之傳承與拓新·以題材及主題為範圍》臺北：文津，2000年。
- 廖國棟：《魏晉詠物賦研究》臺北：1990年。
- 蕭統編：《昭明文選》臺北：三民，2001年。

(二) 學位論文

- 呂光華：《南朝貴遊文學集團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年5月。
- 張秋麗：《漢賦六朝紀行賦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6月。
- 遊適宏：《祝堯「古體賦」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5月。
- 陳盈妃：《歷代詩話中的「曹植論」研究——以宋遼金元明詩話為範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年。
- 游嘉琳：《素樸與感傷：漢魏心靈與曹植詩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20年。
- 呂筱薇：《宋玉、曹植、陶淵明辭賦中神女形象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22年。

(三) 期刊論文

- 石雲濤：〈洛神賦的寫作時間〉，《河南師大學報》，1981年5月。
- 洪順隆：〈論洛神賦〉，《華岡文科學報》第15期，1983年12月。
- 顧偉列：〈王燦的登樓賦〉，《語文學習》第4期，1982年。

